



“秦权钱”质疑^{*}



曾维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清代自同治以降,有多种钱币论著刊行于世,其中不少都著录有认为是秦代“权钱”的拓图。所谓“权钱”,通常是指由古代官府铸造的一种形似流通钱币,但比流通钱币大且重数倍,用于检验流通钱币是否符合标准,以防私铸减重钱币的器具。亦可称之为检验流通钱币是否符合标准的“砝码”。关于秦代“权钱”问题,研究者甚少。但是,这关系到秦代货币制度问题,有必要作一深入研究。

清李佐贤(字竹朋)在所著《古泉汇》“秦”部分刊有“权钱”图十二品(图一~图一二)。细看这些图,根据大小可分为两类,一类稍大,如图1、2、3、12;一类稍小,如图4、5、6、7、8、9、10、11。不过这两类图总体上都偏小,而且这两类图分别大小基本相似。可能是因刊行需要,依据原物或原拓图所摹。其中作者对图1、2、3三品评说为:“此权钱,面五字,有外郭,背平,三品同。第一、五、九皆纪数,二至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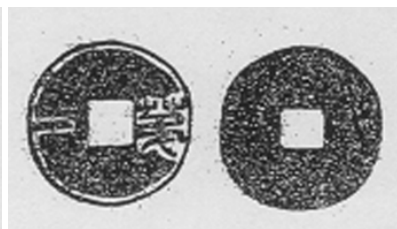
图一



图二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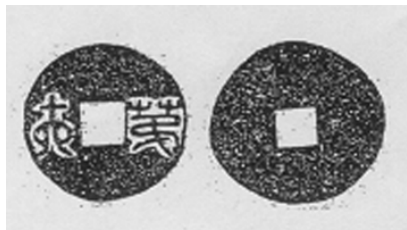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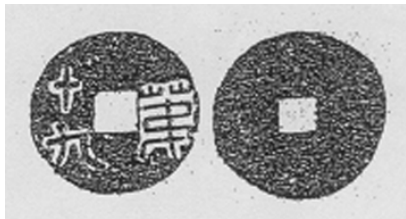
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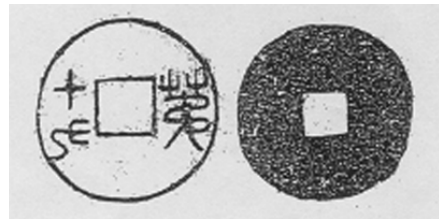
图九



图一〇



图一一



图一二

*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J50405)成果之一。

当俱有之。今未见。重皆四两，抵半两钱八枚。盖恐半两盗铸轻小，故以此钱权之也。此旧谱所未见，今为刘燕庭、鲍子年所藏。”对图 4、5、6 三品评说为：“此亦权钱，第一、第十、第十一纪数，三种面一、三微有外郭，背俱平。形模与重四两者同而轻小，仅抵四分之一。盖重一两者。以一枚半两二枚也。”对图 7、8、9 三品评说为：“形同前，俱无轮郭。一、二纪十六、十八，三纪十十，当系二十也。字在上下较异，合前自一至二十，当有二十品。今所见止此，《丛话》云：曾见大半两泉，特厚重，上下横列‘第八十八’四字。今虽未见此泉，然可证次类皆秦制。”对图 10、11、12 三品评说为：“形亦同前，而三品以次迭大，一、二无郭，三内外周郭。一、三‘九’字俱传形，二含隶意，已开汉隶之先声矣。”《古泉汇》成于咸丰年间，刊行于同治三年（1864 年）。

清戴熙（字醇士）在所著《古泉丛话》中云：“余曾于姜氏拓本见‘第十六泉’，大如秦半两，右‘第’左‘十六’，乾隆诸老辈鲜能得其掌故，后于都肆见大半两泉，特厚重，上下空处横列‘第八十八’篆文，青绿沈古，始知此与两留泉皆半两别种也。翼日即有人以三万泉攫去，未获一拓本，惜哉。”《古泉丛话》成于清道光 17 年（1837 年），刊行于清同治 11 年（1872 年）。清刘师陆在戴熙的文后云：“嘉庆间胡安之客游西安，见杭州马君（按：即马爱林）所得秦钱三品，其一曰‘第一，重四两’，二曰‘第五，重四两’，三曰‘第九，重四两’。质体厚重，色亦古润。安之乞得其‘第五，重四两’一品。后遇师陆于京师，因转赠焉，其文‘上第下五，左重右四两’，面有轮廓，背平夷。窃目之为‘秦权钱’。每取大半两相准，重抵此钱八分之一，或少过之，少不及者，皆是真秦半两。其质虽大而甚轻薄，仅及此钱十二分之一者，乃汉初半两也。师陆识。”

清鲍康（字子年）在所著《观古阁泉说》中云：“马爱林有古泉三，大逾当十，极厚重，面微有郭，背平，篆文曰‘第一重四两’、‘第五重四两’、‘第九重四两’，精妙古朴，藏泉家所未有也。胡安之乞得‘第五’一品，后赠青园（按：即刘师陆），今在余处。其‘第一’、‘第九’二品，燕庭得之。近闻已归继幼云

矣，《泉汇》载之，目为‘权钱’。”《观古阁泉说》刊行于清同治 12 年（1873 年）。

清江标（字建霞）在所著《古泉拓存》中录有“第十六”、“第十九”钱两品（图一五、一六），并云：“李氏（按：即李佐贤）曰：此权钱重皆四两，抵半两钱八枚。盖恐半两盗铸轻小，故以此钱权之也。此旧谱所未见，今为刘燕庭、鲍子年所藏。”《古泉拓存》成于清光绪 17 年（1891 年），或以后。

民国年间由丁福保编纂的《历代古钱图说》在“秦钱”部分亦著录有 15 品被认为是“秦初权钱”的拓图。这些拓图当是搜集了清人著作中的资料，亦有少量增添。但较之李佐贤《古泉汇》中的摹图更具实感，当是据实物所拓而刊。为了说明问题，现亦转录之（图一三~二七）。此所录钱图亦见于丁福保所编《古钱大辞典》。

另外，近年有报刊载文亦介绍一枚“秦权钱”。该钱面有阴文“第十七 重四两”六字，钱背无字，面背均有内外郭（图二八）。据介绍，此枚“秦权钱”上世纪 50 年代初发现于西安。

以上所见“秦权钱”资料，包括摹图、拓图，以及文字描述等，其资料来源，似均或为坊间所传之品，或得于“都肆”，或为钱币收藏同好之间互相转赠。其观点也基本相似，认为秦代存在“权钱”，其原因“盖恐半两盗铸轻小，故以此钱权之也。”

当然，不能说坊间所传之品就一定不可信。但是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尚未见任何有关“秦权钱”的记载。宋代洪遵所撰《泉志》，共收录有五代以前中外各种钱币达三百余种，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钱币资料，其中亦未见著录有“秦权钱”。另外，现代考古发掘中亦未见有确认为“秦权钱”的实物或相关的资料。因此，秦代是否存在“权钱”尚是需要研究的。

上文已说，“权钱”通常是指官府用于检验流通钱币是否符合标准，以防私铸减重钱币的器具，也就是说，“权钱”是货币管理的一个方面。这样，弄清秦代的货币管理制度，对研究当时是否存在“权钱”应是有价值的。关于秦代的货币管理制度，论者不少，但尚有不足，兹有必要作一论述。

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

的封建专制王朝。秦王朝推行了诸多划时代的政策措施,对我国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根据文献记载和已有的考古资料看,秦统一全国货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统一货币的形制。秦统一全国后,废除各国原用货币,统一为黄金和铜钱两种。其中铜钱面文为“半两”,并规定“重如其文”,即“重十二铢”。《汉书·食货志》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贞《索隐》载顾氏按:《古今注》云:“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另外,根据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秦统一的铜钱形制为:圆形、方孔、素背、内外无郭,面有篆文“半两”两字。

二、统一货币的铸造权。秦统一全国货币,实行由官府统一铸造,禁止民间私自铸造。《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有记载说:“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镛)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镛),来诣之。’^⑪”这段资料明确记载:某里士伍甲、乙捆送男子丙、丁及新铸造的钱一百一十枚,铸造钱币的模具两套,指控说:“丙私自铸造这些钱,丁帮助他铸造。甲、乙将他们抓住,并在其家里查到这些钱币和铸造钱币的模具,一并送到。”这充分证明,秦代货币是由官府统一铸造,禁止民间私自铸造,凡是私自铸造货币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并已得到普遍实行。另外,《太平御览》引《楚汉春秋》曰:“项梁阴养生士九十八,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⑫”这一资料记载了项梁在起兵之初,只能以所养之士在“室中”私自“铸大钱,以具甲兵。”也反映了秦代禁止民间私自铸造货币的情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秦代规定货币由官府统一铸造,并非一定由中央政府集中统一铸造,而是由中央和地方官府分别铸造的。有论者根据解放以来,全国许多地区陆续发现的,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半两钱钱范资料研究,指出:“秦半两钱范除秦

都咸阳周围以外,在陕北绥德、四川、安徽、河南、北京等地均有发现,这些钱范的形制及材料都带有极具特点的地域特征,因此秦半两钱的铸造不仅仅限于秦代都城,同时也在封邑郡县进行半两钱的生产。^⑬”对个别钱范的时间认定或许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以这些资料证明秦“半两”钱范,在秦都咸阳以外的地区也有发现,当是没有问题的。

钱范是铸造钱币的重要工具,一般只会发现于钱币铸造地。而钱币与钱范不同,钱币可以在全国各地流通,在不同的地区发现是很正常的。秦代钱范实物发现于不同地区的事实,可以证明秦代尽管统一了钱币的铸造权,但并不是由中央集中统一铸造,而是由中央和地方官府分别铸造的。

秦代实行由官府统一铸造货币,但是,由于当时标准化程度不高,所铸造的货币,除了基本形制和面文一致以外,并不十分规整,存在大小不一、厚薄不均、轻重不等的情况。

根据所发现秦钱范上的钱模测定,其钱径不等,最大为3厘米,最小为2.3厘米,差异较大^⑭。此外,钱模的深浅,穿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如1983年9月,在陕西临潼油王村发现的秦“半两”铜母范,钱径2.7厘米,约厚0.25厘米,穿每边宽0.9厘米^⑮。1980年10月,在安徽贵池发现的两件“秦半两”钱范,钱模径3厘米,穿宽0.7厘米^⑯。1994年4月,在陕西绥德县发现的三合铜质半两钱范,据测定:其第一合“钱模直径26.5~27.8,穿宽7~8.5、深约1.5毫米。”第二合“钱模直径27.8~28.3、穿宽8.5~9、深约1毫米。”第三合“钱模直径25.5~27.6、穿宽7.5~8、深约1.2毫米。”^⑰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当时所铸钱币的标准是不严格的。

除了钱范资料以外,考古出土的钱币实物资料亦是如此。有论者曾指出:“秦始皇推行的货币标准化还是不完善的。大量的发掘表明,秦半两在尺寸、重量上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陕西凤翔高家河出土的秦半两,形状相同,大小不一。经过检选,约有十二种之多。厚重轻薄不等。最大直径3.4厘米,重12克。最小仅仅2厘米,重2.25克。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出土的五百八十枚半两钱,最大直径3.2厘

米,重6.72克。最小的直径1.15厘米,重0.2克弱。若按钱文,则秦半两的实际重量应为8克(半两为十二铢相当于8克)。因此,秦代的货币标准化并不彻底,形状和钱文已具备了标准化的特点,然而在尺寸、重量上仍有非标准化的因素。^⑩”此类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颇多^⑪,兹不一一详证。

总之,根据考古发现的钱币实物资料分析与所发现的钱范情况是一致的。秦代因标准化程度不高,各地所铸造的货币不完全一致,存在大小不一,厚薄不均,轻重不等的情况。尽管如此,秦代所铸钱币的基本形制和面文还是一致的。

三、统一货币行用权。秦代规定,凡是由官府铸造、发行的货币,无论大小、厚薄、轻重,都必须统一使用,不得挑拣,不得拒绝使用。《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有记载说:“官府受钱者,千钱一釜,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⑫即明确规定:官府收入的钱币,以一千钱为一釜(按:釜,是一种用竹或草等编制而成的容器。)并盖上主管官吏(丞、令)的印章封缄。不满一千钱的,也同样要盖章封缄。钱币不论好坏,都混放在一起。启用时,要先交由原封缄的官吏(丞、令)检查,然后才能启封使用。百姓在市场交易中使用钱,不论钱的质量好坏,都要一样使用,不得挑选。同时还记载:“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金布。”^⑬即规定市场中的商贾和政府的官吏,都不得对通行的货币有所挑选,凡是有挑选货币的,而列伍长不告发,吏监察不严格,都违法有罪。

另外,在《关市律》中记载说:“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龕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关市。”^⑭即规定,从事手工业和官府出售货物,收取钱时,必须把钱直接投入“龕”中(按:“龕”,是一种陶或竹制成的容钱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龕,受钱器也。从缶、后。古以瓦,今以竹。声大口切,又胡講切。”^⑮《汉书·赵广汉传》载:“……又教吏为龕簞,及得投书,削其主名……。”其记载苏林曰:“龕,音项,如瓶,可受投书。”孟康曰:

“簞,竹簞也,如今官受密事簞也。”师古曰:“龕,若今盛钱藏瓶,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龕或簞,皆为此制,而用受书,令投于其中也。”^⑯)并且使买者看见投入。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将要罚一副铠甲的代价。这一规定,一方面可能是防止营业人员贪污货款;另一方面,当是规定在市场交易中所使用的钱币,不论质量好坏,都要一样使用,不得挑选。

以上睡虎地秦墓竹简中《金布律》、《关市律》的资料,完全可以证明,当时法律规定,凡是由官府铸造、发行的货币,无论大小、厚薄、轻重,都必须统一使用,不得挑拣,不得拒绝使用,否则属于违法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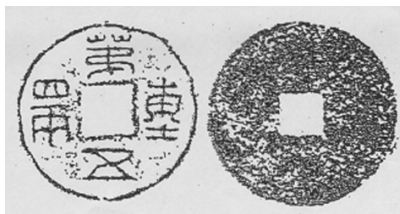
秦代在钱币管理上的这些法律规定,说明当时推行统一货币的措施颇为坚决、强硬。从某种程度上说,秦代所铸货币因标准化程度不高,存在大小、厚薄、轻重不一的情况,是不符合钱币价值规律的。其货币的信誉不是靠自身的价值、标准来保证,而是靠封建专制国家法律进行强制推行的。因此,秦代在货币使用管理方面是不应该再使用与法律规定相抵牾的“权钱”。也就是说,秦代在货币管理上并不需要“权钱”。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看,秦统一货币,规定为无内外郭的方孔圆钱,面文为“半两”(重十二铢),素背。从实物资料看,尽管标准化程度不高,但是基本形制、文字还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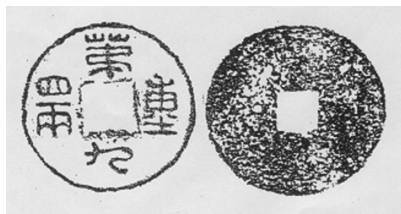
如果秦代确实存在以“权钱”检验货币的制度,那么“权钱”必定由官府统一制定颁布。这样,至少“权钱”的基本形制、文字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从丁福保编纂的《历代古钱图说》拓图和图28看,这些“权钱”不仅造型不一,有大有小,有的有郭,有的无郭,有的面有内外郭,背则无郭(图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一八、一九、二五),有的面背均有内外郭(图二八)。而且面文也不同,有的铸有“第×重四两”(图一三、一四、一五、二八),有的则铸“第×”(图一六、一七、一八、一九、二〇、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七、二六),有的仅铸“××”编号(图二一),个别还铸有背文(图一八)。文字排列也不统一,有的为“上下右左”排列(图一三、一四、一五、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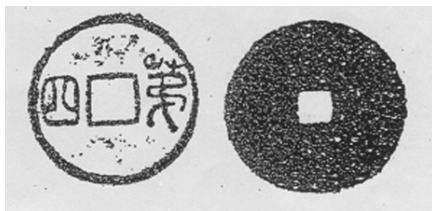
图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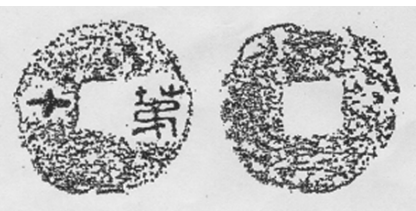
图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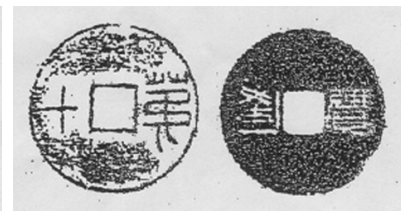
图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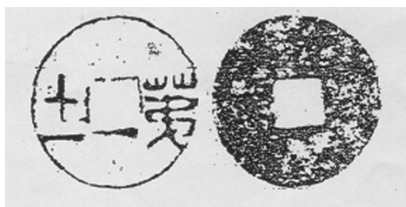
图一六



图一七



图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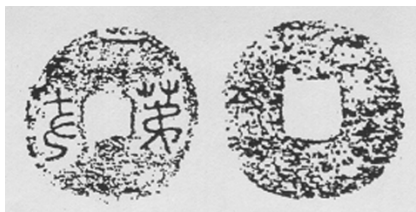
图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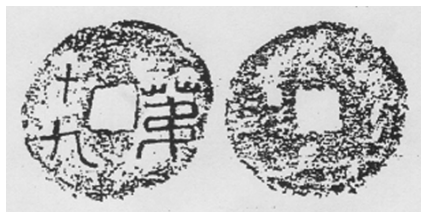
图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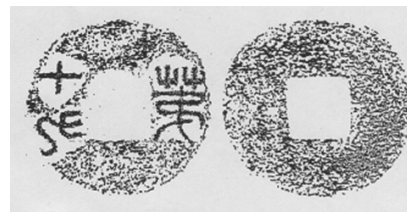
图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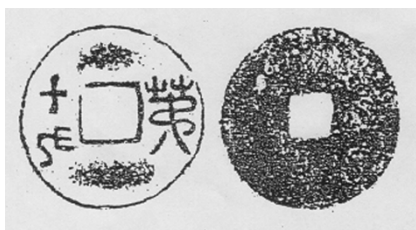
图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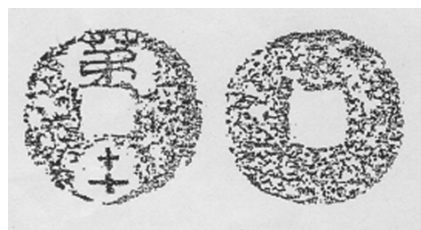
图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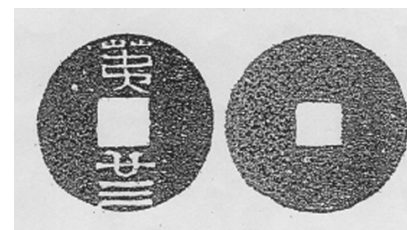
图二四



图二五



图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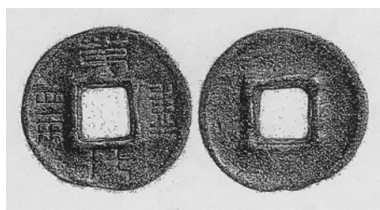
图二七

有的为“右左”排列(图一六、一七、一八、一九、二〇、二二、二三、二四、二五),有的为“上下”排列(图二六、二七),也有的仅在穿左铸上下两字(图二一)。另外,面文字体、字形也不同,有的为篆书,有的则具“隶意”,差异颇大。有的面文中的“十”字写法也存在问题,如图24上的“十”字写法,即横长竖短,在秦代应作“七”字,而“十”应作横短竖长之形(关于“七”、“十”字形问题,下文再作详释)。如果将该字释作“七”,那么其面文为“第七九”,文义不通。如果释作“十”,为“第十九”,文义虽通,但“十”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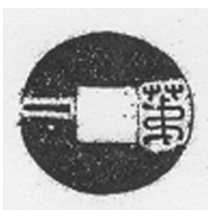
形与当时不符。因此,尽管当时标准化程度不高,而作为由官府推行的检验货币的“权钱”,不至于连基本形制、文字等比货币还混乱。这显然不合常理,也难以解释。

这里尚需要指出,上世纪50年代初发现于西安,钱面有阴文“第十七 重四两”六字的“秦权钱”(图二八),其中“七”的字形是有问题的,秦代尚无此写法。

我国古代“七”与“十”是颇为特殊的字。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曾说:“在西汉时,七字书作十,



图二八



图二九



图三〇



图三一



图三二



图三三



图三四



图三五



图三六



图三七



图三八



图三九



图四〇



图四一



图四二



图四三



图四四



图四五



图四六



图四七



图四八

“七”型才完全取代“十”型而成为“七”字的固定写法,从此之后就再无变更^⑤。

根据这一研究成果,秦代的“七”字写法作“十”型,竖划较“十”字型短。也就是说,秦代

“七”字尚无图 28 上的这种写法。因此,这枚“权钱”不应是秦代之作品。

另外,有论者根据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文帝十三年天平衡杆,上面有“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等字样,认为:“足证秦汉时代虽然方孔圆钱已为通用货币,还是要称它的重量是否合于标准(这可能只是‘抽查’,或者是积若干钱一称,如果每枚都称是不胜其烦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对于货币管理的严格,一方面也说明在某些地方还是同于称量货币、或者还保存这种习惯。^⑦”其实,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这一资料只能证明西汉的货币管理制度,与秦代货币制度无关。这里统概“秦汉时代”,当是不准确的。

还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满城发掘了两座汉墓,出土了一批

中画甚短,与十字极相似。^⑥张勋燎先生对此则作过详实考证,指出:在先秦时期,即秦统一之前,“七”字写作“十”型,而“十”字写作“”型或者在“”中间加一点,此时“七”字和“十”字在写法上尚有分别,但到了秦统一中国之后,“七”字仍写作“十”型,但是竖划较“十”字型较短,而“十”字也写作“十”型,“七”字和“十”字的区别极不明显,整个西汉两百多年,“七”字都保持了秦代常用的写法。到了新莽建国三、四年后,曾一度把“七”字写作“来(来)”型以和“十”字相区别,到地皇三年和东汉初年,才又恢复了西汉和秦的写法;到了东汉建武二十九年,出现了末笔右曲的新的字形,即开始把“七”字写作“十”型竖划末端向右弯曲之型,类似于今日的“七”型,和往日横长竖短、竖划末端不弯曲的“十”型同时并用;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六年以后,

“宫中行乐钱”共 40 枚。这些“宫中行乐钱”为“方孔无廓，正面铸篆体阳文，背面平。直径 3.3 厘米。其中 20 枚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钱样较大，直径 3.7 厘米，用以补‘第三’之缺，可见当时此类铜钱不只一套）。”（图二九~四八）。另外 20 枚“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与“宫中行乐钱”同时还出土有一枚通体错金银的“铜骰”^⑩。这完全可以证明，出土的这些物品是当时的娱乐器具。清人所著录并认为是秦代“权钱”的拓图，其中有个别形制特征与铸有编号的“宫中行乐钱”颇为相似，如图 8 与图 46 等。因此，清人所著录并认为是秦代的“权钱”，有个别很可能属于汉代的“宫中行乐钱”。由于汉代“宫中行乐钱”流传不多，且形制与钱币接近，遂被误认为是秦代的“权钱”。可以说，河北满城汉墓的“宫中行乐钱”，为解决“秦权钱”问题提供又一重要证据。

总之，根据秦统一货币的措施和管理制度看，当时是不应有“权钱”的。认为秦代统一全国货币后，为了防止民间私铸，铸造了一种厚重的“权钱”，以检验“半两”钱的分量，是没有依据的。自清代同治以降所著录或发现的“秦权钱”，其形制、面文等特征均与秦代不符，不足为信。

注释：

（清）李佐贤：《古泉汇》同治甲子年镌，利津李氏石泉书屋藏板。又见《陈介祺批校〈古泉汇〉附〈续泉汇〉》，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 2 月版。

、见《说钱》，第 251 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 年 6 月版。

见《说钱》，第 4 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 年。

见《说钱》，第 1106 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 年 6 月版。

丁福保编纂：《历代古钱图说》，第 92~95 页，齐鲁书社出版社发行，2006 年。

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上册），第 971~974 页，中华书局，1982 年。

马传德：《“秦权钱”——秦始皇统一货币的象征》，《新民晚报》2005 年 10 月 11 日 47B 版。

《汉书》卷 24《食货志（下）》，第 1152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史记》卷 30《平准书》，第 1418 页，中华书局，1959 年 9 月版。

⑪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252 页，文物出版社，1978 年。

⑫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 835·资产部一五·钱上，第 3728 页，中华书局，1960 年。

⑬ 姜宝莲：《秦汉半两钱范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5 期。

⑭ 根据姜宝莲：《秦汉半两钱范的研究》一文中“半两钱范出土情况一览表”统计。《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5 期。

⑮ 张海云：《陕西临潼油王村发现秦“半两”铜母范》，《中国钱币》1987 年第 4 期。

⑯ 卢茂村：《安徽省贵池县发现“秦半两”钱范》，《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 4 期。

⑰ 师小群：《陕西绥德出土半两铜合范》，《中国钱币》2000 年第 2 期。

⑱ 韩钊：《试论中国古代货币标准化》，《中国钱币》1984 年第 1 期。

⑲ 曾维华、王冕：《论刘邦的货币改革》一文所引相关材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

⑳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55 页，文物出版社，1978 年。

㉑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57 页，文物出版社，1978 年。

㉒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68 页，文物出版社，1978 年。

㉓ 《说文解字》，第 110 页，中华书局，1963 年。

㉔ 《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第 3200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

㉕ 陈直：《汉书新证》，第 265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 3 月第二版。

㉖ 张勋燎：《“七”、“十”考》，《古文献论丛》，第 1 页，巴蜀书社，1988 年。

㉗ 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第 34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 271~273 页，文物出版社，1980 年。



名物新证

本期导读

一、《像生花与簪花、供花》

作者注意到了一个小小的事物——古代的像生花,现在一般叫做假花,像生者,仿生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涉及到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习俗。像生花在古代的使用范围要比我们现代人想象丰富得多,不仅用于装点居室,最多的是作为首饰,簪于发髻、簪于幞头巾子,数量多,品种多,个体大,而且无论贵贱,无论男女。这种习惯,在现代社会已经基本消失了。香花供奉是传自西域的佛教,直到现代依然保持这个传统,古风犹存。至于用像生花饰于林木,改变自然,出现反季节的“春景”,耗费了宝贵的资源,暴露出统治者的荒唐,是历史上著名的丑闻。

像生花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在现代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地发现,远自汉唐,近至元明,历历在目。实物有软质的绢纸花,硬质的有木质涂金莲花,还有花、簪结合的金银花簪,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乱真,令人惊叹,不能不佩服先人的丰富情感、细腻的观察力,超强的创造力。像生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是一种精神内核与物质外壳的结晶。

因为时间的推移,大量的像生花陨落了,湮没在尘土之中,留下的只是沧海之一粟。如果我们仅仅依靠考古发现来研究像生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借助文献材料。只有文献材料才能使得孤立的器物连贯起来,生动起来,当然缺乏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不过是一堆杂乱的记忆,是一些不可捉摸抽象概念。因此无论从考古角度,还是文献角度来研究事物,必须两手并举,这个原则不应为我们的专业所限制。

二、《“秦权钱”质疑》

清代后期多种钱币论著刊行于世,著录有称为秦代“权钱”的拓影。所谓“权钱”,并非是流通货币,而是用于检验流通钱币是否符合标准的一种砝码,它取圆钱的形状,由古代官府铸造以防私铸劣钱。关于著录的“权钱”,真假莫辨,研究者少有兴趣。曾维华教授从历史文献中看到,秦代铜钱并不存在所谓称量的说法。《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这个专门记载秦钱使用的律法,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权钱”的存在。同时作者又从秦汉间“十”和“七”的不同写法,揭穿了“秦权钱”的虚假性,从而大胆否认了“秦权钱”的历史存在。

宋代金石学经过元明的发展,清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范围不断扩大,其中的品类越来越多。好事者搜罗各种实物,加以描绘、捶拓取影,或加说明,编辑刊行,此类书的数量相当庞大。钱谱类书籍更是层出不穷,人们照谱识钱,作为觅钱之资。收藏古物从来是在雅俗之间,以欣赏、博物、怀古者为雅事,以居奇售卖者为俗态。只晚宋代起,贩售古物就夹杂假货,清代的假货多如牛毛,充斥市井。收藏家稍有疏忽,这类假古董就会混入,著录难免真伪杂陈。因而对于古代著录的古物,特别是清代以来的著录,研究者必先辨伪,此为头等大事。辨伪有文献证明、有考古实物验证,当然还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就这“秦权钱”而言,不仅理论上不能成立,字形上也有疑点,曾教授的文章已经论述透彻。但是有两点尚可以深入。其一,秦半两与汉五铢的钱形上有一个很大区别,秦半两钱无郭,汉钱有郭,如果“秦权钱”仿照秦钱,应是无郭,而著录却有郭。这个也是坊间伪造的过硬证明。其二,此类“秦权钱”并非全是作伪,那么它们不是“秦权钱”,它应该是什么呢?其实在西汉陵山汉墓出土的实物,人们给了明确结论,这是“行乐钱”。那么在否定的同时应该适当的论述“行乐钱”的形制,这样,文章做到功德圆满了。

三、《谈“节”》

节是古代官方权力的象征,被授予权力叫做“持节”,节代表了朝廷权威的权威,持节者因此获得特殊的身份。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保持汉使尊严,维护汉廷的荣誉,史称“苏武节”,彪炳史册。

节的形制并非是一层不变的。人们从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节,认识到战国楚的王命之节的具体形状和文字内容。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节只能从文献得到抽象的概念,或误识会为后世所见的龙头拐杖加流苏的节。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壁画出现了节的形象之后,陆续在其他汉晋壁画也出现了节的形象,人们对汉晋之节有了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并有专文讨论。孙彦《谈“节”》一文收集了新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分析壁画和实物上的图像,深入探讨了节的形制,它的质地、色彩、节旒的形状、持节者的服装和持节制度,无疑加深对节的认识,促进我们全面地研究这个器物。

持节者著绣衣,这个绣衣不是一般的颜色鲜艳、装饰华丽的丝织服装,而是绣绘之衣,是持节者专用服饰,可能有特殊的纹样和颜色。羽人是仙人,他不穿凡间官方的绣服,而是羽服,我们不能混淆这两个世界,不要把绣衣套到羽人身上去。

(陆锡兴)